

趙三多和

義和團運動



威縣人民政府

前 言

义和团运动从1898年赵三多率领义和拳起事开始，已整整一百周年了。它的发展最高峰是在1900年，所以也是二十世纪初被压迫国家中最早的一次属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从这场运动发生、发展全过程来看，义和拳是最重要的。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看成是义和拳运动的延续与发展。义和拳运动就发生于“直东交界”地区，即今天的河北威县梨元屯、沙柳寨一带，其关键领袖就是赵三多。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来，史学家们在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中，形成了共识：威县是义和团（拳）运动的发源地；赵三多是义和团的关键领袖。赵三多首先在中国北方提出了“助清灭洋”这一类口号，以义和拳名义发动起义。他自1898年秋起义至牺牲，历时五年，起义三次，坚持斗争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他是义和团运动史上唯一身历义和团运动始终的重要领袖，是威县人民的骄傲。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民族的日益觉醒和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

作为义和拳（团）故乡的人民，我们有责任弘扬这种精神。威县县委、政府领导十分注意鼓励史学工作者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多年来，威县的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不仅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而且深入民间实地考察、调查访问，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了纪念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

我们辑印了这本名为《赵三多和义和团运动》的小册子，我相信此书的付梓，对于地方史的研究和当前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编者

目 录

前言

- 在纪念义和团起义一百周年报告会上的讲话 冯思德 (1)
- 在赵三多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顾自忠 (4)
- 简说赵三多和他领导的义和团 顾自忠 (9)
- 景廷宾反洋教斗争考略 李金鹏 (31)
- 附：赵三多研究会组成人员 (40)

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冯思德同志在纪念义和团起义一百周年报告会上的讲话

(1998年10月23日)

同志们：

今天，我很高兴参加由威县县委、县政府组织的这次纪念义和团起义100周年报告会。威县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举办这样一次报告会及其它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刚才，原威县政府县长、赵三多研究会会长顾自忠同志作的义和团斗争报告，全面、真实、生动，听了很受教育、很受启发。威县是一块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土地，历史上孕育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和事迹，民族英雄赵三多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100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赵三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义和团起义，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威县人民应以赵三多这样一位英雄人物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义和团运动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次农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抗击八国联军的民族自卫战争。它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梦想，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的统治，在客观上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加速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覆灭。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之一的爱国运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义和团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英勇抗争、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和革命气节，对当

前的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仍然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在义和团起义100周年之际，围绕纪念义和团运动这一主题，广泛开展深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历史、了解过去，可以有力地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更好地鼓舞人们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威县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民族英雄赵三多的故乡，县委、县政府在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及有关的文物管理方面倾注了很大精力，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具体工作，加强了文物资料的征集与管理，投资修缮了义和团议事厅。你们在广泛搜集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邀请省内外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专家来威县考察、讲学，对义和团研究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确定威县是义和团运动发源地问题上，不仅给威县争了光，而且为河北省赢得了荣誉；去年组织的大型爱国主义活动“邢台市庆祝香港回归万人长跑活动的点火仪式”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中华民族是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是振奋和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如何以纪念义和团起义100周年为契机，把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此，我提四点希望：一要建好并发挥好基地的作用，在这方面我省各地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威县要结合本地实际，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做法。要研究多渠道投资的路子，在发挥好义和团议事厅作用的同时，千方百计

筹建好义和团纪念馆；二要把对义和团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要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建起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加强同周边市县的联系。力争在2000年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时，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三是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同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当前尤其要做好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把决议精神迅速变成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

最后衷心祝愿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威县的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成绩！

在赵三多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赵三多研究会会长 顾自忠

赵三多研究会的成立，不仅是为了今年（1998年）10月25日纪念赵三多领导的义和团首次起义一百周年，也不仅仅是为了迎接20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一百周年，更重要的是为把威县对赵三多的研究引向深入，为义和团运动研究会提供更多的资料。因此，我提醒几点，以便共同探讨。

一、赵三多研究会成立的意义

赵三多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县对赵三多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有组织、有领导地、更加系统、更加科学地研究阶段。县委、政府这一英明决策，必将载入威县的历史史册。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近一百一十年，是中国人民浴血反帝斗争的百年斗争史。毛主席在论述近百年中国革命的斗争史时，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做了很高的评价。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等爱国志士们的反帝行动，永远应受人民歌颂的话，那么代表着广大民众进行过轰轰烈烈反帝斗争的来自民间的英雄，象洪秀全、赵三多、朱红灯等同样可歌可泣，同样应受到人民的歌颂。正因如此，建国后近代史专家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发自民间带有民间自发性进而逐渐觉醒的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倾注了极大的努力。通过近四十年持久的、深入的、反复的调查研究，力求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截止目前，史学家们这一宏愿已基本实现。义和团的发祥地在威

县，其领袖是沙柳寨的赵三多，这是威县人民、河北人民、中国人民的自豪，它倾注了多少专家学者的心血；它倾注了多年来国家对这一课题的关注、支持！

正因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廓清，国内研究近代史的专家学者们和所有关注近代史的人们才清楚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个威县，有个沙柳寨村，有个义和团的首领赵三多；国际上研究近代史的专家学者们，特别是关注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友人们，才了解到中国有个威县，有个沙柳寨，有个义和团首领赵三多，由此，而了解到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革命发展到今天确实不易，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继承前辈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高举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旗帜，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逐渐强大，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这些伟大的斗争、伟大的变革，需要对今人和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义和团的斗争史是极好教材。作为义和团的发祥地的威县，把义和团斗争的史迹展示给人们，是义不容辞的。县委、政府已深深意识到这一点，才决定成立赵三多研究会。之所以定名为赵三多研究会，是区别于国家的义和团研究会。国家的义和团研究会是史学界近代史专家学者们对全国各地义和团的斗争史迹进行研究；我们的赵三多研究会是对赵三多和他领导的义和团的研究。毫无疑问，赵三多研究会是隶属于国家义和团研究会的民间研究团体。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研究会是微不足道的，而只是研究的层次不同。义和拳(团)的发祥地和首领在威县，我们身处英雄成长的人文环境，我们经过调查，会比专家们掌握更多

的资料,他们要做更深入的研究有待于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以便做出更符合历史、更客观、更科学的结论。可见这个研究会的成立绝非应景而立,而是肩负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

二、赵三多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地位及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现状

赵三多和他领导的义和团,在义和团运动中起义时间最早,经历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这是国内国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公认的。取得史学界的共识、首肯绝非易事。现披露一点研究过程,供大家思考。一是国内的,二是国际的。国内的可从两方面谈,一是专家学者的研究。这要从五十年代说起,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权威人士戴逸先生主持这一课题,责成山东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具体搞,开始由徐绪典先生主持,路遥教授等人参与,曾于1958—1961年着手来河北调查,特别是1959、1960年南宫、威县、清河合并大县时,尽管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山东大学师生来了八十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整理成资料。从山东的红灯照,从山东的冠县追根溯源,逐渐移向威县的赵三多,后因文革暂时搁置起来。七十年代由路遥先生主持后,先是教授们来威县调查,后组织历史系两个班的学生和两名研究生,由路遥教授率队两次来威县住下来,先后搞了近两个月,走访近百个村庄,上千人次,掌握了更系统更翔实的材料,加上教授们翻查搜集国家档案资料,教会当年的记载,写成了《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并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国内研究的第二方面是我县的研究,最早郭栋臣老先生(原冀鲁豫边区参议员,河北文史馆馆员),根据他早年的记忆和调查采访,整理成《义和团之缘起》这份极为珍贵的资料。

进入六十年代后，又引起我县一些人的注意，渐渐投入了这一史实的调查。我们实地调查，查阅威县县志、冠县、临清、武城、邱县、南宫、冀县、枣强、武邑、故城、广宗、平乡、正定等县的县志，然后写成了一些材料。修复了义和拳议事厅后，为赵三多树碑立传。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们不仅密切配合了山大和国外学者的调查，在重大问题上均做出了我们可贵的努力，象赵三多的出身问题，原东昌府知府和冠县知县向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奏折说他家有良田两顷，是个秀才。在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盛行，这被认为是在农民起义队伍中混进了出身地主知识分子的阶级异己分子，当时这是史学界的大忌。我们的调查恰恰相反，赵三多只有二亩多破地，靠打短工、作勤行买卖度日，更不是什么秀才。冠县的知县曹倜和东昌府知府洪用州为湮息势态，向皇上邀功请赏，才把赵三多说成是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并受到了招安。这一问题的突破，进一步推动了山大的深入调查。

国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有22个国家，如美、英、法、日、波兰、匈牙利、加拿大等来过我县，或考察研究，或参观访问。美国奥里根大学教授周锡瑞两次来我县，第一次一气住了八天，下乡、下村实地考察。日本的四名学者协同中国的学者南开大学陈振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程啸教授，《光明日报》文史部主编阮方纪等，共同考察。后来这些国外学者，以史学家的良知，科学地给赵三多和他领导的义和团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在国际上造成了良好的影响。

总之，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经过近四十年的考察研究，认为威县确实是义和团的发祥地，其首领是沙柳寨的赵三多，大家不仅在学术讨论会上是这样讲，而且把近代史的教材也

做了这样的修订。这一结论确实实来之不易呀！

当前，国内、国际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动向是：一义和团运动除由直隶、山东交界地区特别是河北南部威县一带发起波及京津，还波及到哪些省和地区？二这一运动为什么没在沿海省份发起，而在内地、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河北南部威县一带发起？其历史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怎样成为这一运动发起的适宜的土壤、气候条件。总之，正在扩大涉及面，正在往深处挖掘。

三、赵三多研究会的任务

从国内外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现状已清楚地看到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从国内国际的大环境去考察赵三多和他领导的义和团，这是史学家的任务。我们主要是从威县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考察研究。为什么威县成为义和团的发祥地？赵三多这个英雄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经过我们的努力，要事出有据，言之成理。使散见的资料更系统、更科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其次，我们要利用这一优势，配合政府把赵三多的故乡办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的同志可能说现在赵三多和议事厅尚未成为省和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原因很多，一是我们汇报不及时，抓得不紧；二是我们尚未拿出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实际的比以往更大的举措。现在县委、政府如此重视，加上我们的努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再次，要借赵三多首次起义百周年之际，搞一次大的纪念活动，当然这不只是开一次纪念会，还有很多具体工作。县委、政府已有安排，研究会要全力以赴，为搞好这一纪念活动，为把赵三多研究引向深入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简说赵三多和他领导的义和团

——纪念赵三多和团起义一百周年

顾自忠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是在1900年，到2000年一百周年时，我国还要举行大的纪念活动和召开世界史学界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学术讨论会。我们所以要提前两年举行这次纪念会，是因为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赵三多首先在威县大地上举起反帝爱国的大旗，发动了义和团起义，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由此迅速波及华北、京津、华东（鲁西、鲁西北）、中原（豫北）乃至全国，形成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

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威县发起，威县是义和团的发祥地，这是中外史学界经过近五十年的努力，通过无数次的实地调查，翻遍那时中外官方文件和报刊及当事人的笔记、日记等资料，通过科学地分析论证，得出的一致结论，并写进了大、中专近代史的教科书里，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义和团运动为什么首先在威县发起，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国内外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从世界、中国、威县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民俗的，心态的等）等多方面加以考察、分析、论证，一致确认了的。我只能就我所接触和了解的一点情况，向大家做一些简括的介绍。

一、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绝非偶然。我们首先看一下那时的历史情况，就能一目了然。

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以他们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继英帝国主义之后，法、德、日、俄、美等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对中国进行了武装侵略。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每战必败，被迫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象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态势。

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是必然的。威海地处内陆，首先接触的不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而是充当帝国主义爪牙的天主教、耶稣教的教会及教会的传教士们的欺压和蹂躏，激起了人民群众以反洋教为主要内容的反帝爱国运动，这绝非偶然。

传教士们得以窜入内地的护身符是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据山东大学徐绪典先生综合考察，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来中国的外国公民”、“商人”、“传教士”，都一律享有特殊权利。所谓特殊权利主要指的是“领事裁判权”，就是全体外侨都享有一国外交使节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具体说十九世纪末这种领事裁判权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是外侨犯罪由外国领事组织法庭审理，按外国法律判罪；第二是中外人民间的词讼，名义上是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吏共同审理，实际中国官吏只是“观审”；第三是外国船只和外人寓所，中国官吏无权管辖，如有中国犯人到外船或外人寓所潜匿，中国官吏不能派兵逮捕只能要求引渡。（《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初探，第九页）传教士们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就为所欲为，传教士的寓所、教堂，中国无权管辖，中国犯人逃到那里，中国政府不能去逮捕。

传教士们还享有更高的特权，在政治上，官方明确规定：第一总主教或主教品位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同级；第二分别教中品秩与同级中国官吏相往来；第三教案发生时主教司铎转请护救国公使或领事官，同总署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直接向地方官商办（见《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初探，第十一页）。有的外国传教士被清政府赏给三品或二品顶戴，象山东南境教区主教安治泰就列为总督一级。一般的外国商人和领事，只能在领事和经商所在地以内的二十华里以内活动。传教士们依靠这些特权，持有“盖印执照”，可以进入内地，可以在内地购买土地或租赁土地，建造教堂或其他房舍。正因为传教士们有了这些特权，才得以窜入内地，强占或购买或租赁土地盖教堂，到光绪二十三年（1899年）仅威县一带接连建起教堂二十二座，九十二个村庄有了教民，那时我们这一带连年水旱灾害，加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大量农民濒于破产，割地赔款又加人群的赋银，传教士们摇动橄榄枝，诱使一部分饥民入教以避免清政府的赋银，一些豪绅、恶霸、土匪藉入教逃避清政府的法律制裁。传教士们藉经营教产之名强占或买卖土地，出租土地或经商或放贷，象赵家庄的任老会就是依靠教会发展起来的地主兼商人。教会依仗自己的特权任意欺压群众，特别是他们干涉地方的内政，包揽词讼，给地方官致函片低就可使不入教而与教会小有纠葛的群众入狱，据《威县志》记载：“传教者不分良莠，一概收录，遂使不良分子名为入教，实则借教为护符”。特别是教会强行建教堂，强占各地的“义地”即村中的公共土地，这些“义地”原是学校或庙堂，这引起教会与

当地群众之间的斗争，几乎各地屡见不鲜，梨园屯教案即庙堂之争所引起，下面还另介绍。

据威县县志记载，到光绪二十六年即1898年义和团起义前夕，全县三百三十五个村庄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八户，七万六千一百九十九人，共有土地八千二百一十五顷五亩六分即821505.6亩，人均10.78亩，人均土地的数量不少，但沙碱地占2/3还多，没有任何水利条件，每村只有一眼或三两眼砖井供人畜饮用，耕作又极粗放，只能望天收，产量极低，晒留麦（麦收后不夏播，晒一个夏天秋天再种麦）或春谷一亩收2石（200斤）就得唱丰收曲。威县志记载：“织布、织带、轧花”“农隙之勤苦，借此以维生计”“出境货向以棉布为大宗。”农民除种地之外，所营家庭副业就是手工土织土纺，换取称盐买菜的钱。威县境内的老沙河、老漳河和东临县临清，清河的运河三年有两年决堤，连年水旱灾害，生活难以维系，正如县志记载：“威民生计犹堪使想乎！”随着传教士的内地深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魔爪，伸入到穷乡僻壤，特别是洋线，洋布的倾销，使得土织土纺濒于停产，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改变了自然经济的原有结构状况。前边已说过的帝国主义战败清政府，根据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银两又统统加在农民身上，农民不堪重负。按那时的地亩和人口算，赋银、丁银、役银统加在一起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两，而仅光绪二十五年（1897年）梨元屯亮拳摆会后广平太守（威县属广平府）奉直隶总督之命来威县处理赔偿教民损失达八万两，这能不激起群众的义愤！那时威县经济的落后状况可见一斑。从政治方面看，威县还有一种极特殊的情况。那时在威县东部和东南部并存着六个县一百一十三个插花地，即

所谓境外的“飞地”，属山东临清的十八村（实有十五个，侯贯、桑园的一些村庄）、山东冠县的十八村（实际是二十四个，梨园屯、固献、干集、常庄的一些村庄）直隶邱县的十八村（实有二十二个，柳町、侯贯、王村、贺钊的一些村庄）直隶南宮的十八村（实有十五个，侯贯、桑元、柳町的一些村庄），直隶曲周的十八村（实有三十六个，第什营、白果树、枣元，邵固一些村庄）直隶鸡泽县的鸡泽屯。这些“飞地”即“插花地”，花花插插从县边境西南的北刘村、苏庄到东北边境的团堤、孟村，长达150华里，一个县的“飞地”有的集中连片，有的又不连接，分为两片或三片。这种状况由来已久，直至本世纪四十年代人民政权建立才告结束，并入威县版图。考其形成的原因，要追溯很久。据广平府志和威县志记载，唐朝后期以来，鲁西北、冀南一带“群雄割据，土地得失靡常”，“宋时女真南侵，大河（黄河）以北多为金有。”“元灭金，元太宗六年威县属威州”，而“威州旧治井陘”即现在石家庄地区的井陘，威县就是距井陘三百八十华里的“飞地”，自宋朝以来，这里“群雄割据”战争纷起，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常派有驻军，驻军有很多屯、营。这些屯营或“屯於各边空旷之地且耕且战”或“屯於各卫就近之所且耕且守”，后来原统领这一小片一小片的屯营的长官虽然已到某州县上任，但原统领的营屯就成了他的领地或叫作食邑地。这种一省一县之内存有两省数县的“飞地”的状况，极为罕见。这些“飞地”远距所属县，所属县难以管辖，鞭长莫及，又非所在县管辖，所在县无权管辖，统治极为薄弱，治安秩序常常是异常混乱，时常出现偷盗、强奸、放火、杀人等违法案件，当地管不着，而所属县不便于管，县与县之间你推给我，我推给你，